

舒群文集



● 我们的同伴
醒

杨家岭夜话

枣园之夜

美女陈情

● 秘密的故事

老兵

少年CHEN女(修改稿)

金缕传



舒群文集

·3·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沈阳

舒群文集(3)

Shuqun Wenji

• 我们的同伴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53,000 开本: 850×1168 $\frac{1}{2}$ 印张: 12 $\frac{1}{2}$ 插页: 6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责任编辑: 于雷

责任校对: 林萍

封面设计: 李勤学

统一书号: 10158·761

定价: 1.45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老作家舒群同志的九个中、短篇小说。《老兵》、《秘密的故事》，透过年轻人的友谊与爱情的柔丝蜜缕，塑造了三十年代北方爱国者与革命者大义灭亲、赴汤蹈火的动人形象。《金缕传》、《美女陈情》、《少年 chén 女》（二稿），笔锋蘸饱了至深至纯的爱，彩绘一般刻画了八十年代征途坎坷的老兵与燕雏，倾泻了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

从全部小说可以看出：作者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愈老弥坚；而其冷澈的观察、执拗的探求、峥嵘的文字，则形成了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



丰子恺先生摄于一九三八年夏
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楼顶上

我们的同伴

一九三八年，十月时的武汉三镇，
 一片秋色，不仅是天凉地冷，^{花谢叶落，}而且是
 兵荒马乱，人去楼空。这时候，正是
 日寇侵略军步步逼近市郊，而人
 们已经面临最后的撤退，^走避难。

我为了助编一个文艺刊物的临时
 特刊，坚持工作到十月二十三日。这
 天，我想必须走了，但怎么走呢？一
 共只有两^个退路，重庆和桂林；其路
 线倒有三条：长江上的轮船，鄂汉湘

序

本卷包括短篇中篇小说两部分。

在短篇小说部分，《我们的同伴》写于三十年代。文虽欠佳，但纪事之实与附注之旨可取，故编之入卷。（与其同时发现于浩劫之后、残稿断篇之中所存者，尚有一篇《牛郎欲问瘟神事》，原系《毛泽东故事》供稿之一，破碎不堪，有待重作。另有友人同志于桂林图书馆，偶见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汉口大公报所载的《血的短曲之五》，未及复制，暂告阙如。）其余四篇，皆作于八十年代。

在中篇小说部分，尚缺《满洲的雪》。此篇曾经茅盾同志转予戴望舒主编连载于一九三八年夏秋之季香港星岛日报。早经友人同志们千方百计出谋献策，代为复制，终未实现，奈何。现有四篇，写作年代与上者同，前两篇与后两篇，相隔亦同为四个年代。

噫，人之一生，究有几多年代；思之，不胜感慨唏嘘系之。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五日北京

目 录

我们的同伴.....	1
醒.....	16
杨家岭夜话.....	23
枣园之宴.....	34
美女陈情.....	48
秘密的故事.....	90
老 兵.....	176
少年chén女 (二稿)	250
金缕传.....	318

我们的同伴

一九三八年，十月的武汉三镇，一片秋色，不仅是天凉地冷，花凋叶落，而且是兵荒马乱，人去楼空。这时候，正是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日本侵略军步步逼近市郊，而人们已经面临最后的撤走，逃难。

我为了助编一个文艺刊物的临时特刊，坚持工作到十月二十三日。这天，我想必须走了，但怎么走呢？一共只有两个退路，重庆和桂林；其路线倒有三条：长江上的轮船，粤汉湘桂铁路上的火车，天上的飞机。在码头、在火车站，行李堆行李、堆成山，人挤人、挤扁了人、挤死了人；我呢，挤不近岸，也挤不近站。但飞机场，到处都有枪有刺刀把守；飞机有是有，而飞机太少，国民党大官又太多。人说他们，有如“过江之鲫”；我见他们，倒象“抢机鹬鹑”。我想上机，那比上天还难。

最后，我谢谢这位好心的老朋友——李先生。他买到三张通过洞庭湖开往长沙的船票，除去他和他的女儿两张，给了我一张。在这样紧张的战时，能够买得船票，并非易事；他呀，是通过特殊的关系——怡和洋行，买到美国轮船船

票，而票价高过一般票价十倍还多。他的这个早年丧母而被父惯娇了的、还在大学念书的不懂人情世故的女儿，拿着船票，嘴里一直嘟嘟囔囔，嫌票价太贵：

“票价为什么要这样贵？”

她的父亲——这位念了二十年书的美国留学生、教了二十年书的大学教授，就幽默地说：

“票价不卖这样贵，纽约怎么繁荣呢？”

女儿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见过纽约，她反正嫌票价太贵：

“这是帝国主义明目张胆的剥削——趁火打劫！”

“中国黄种人买美国白种人船票，花多少钱都不算贵；若是黑人花再多的钱，还不一定买得着呢。”

女儿读过不少书，也读过不少美国虐待黑人的事迹，而不管这些，她反正嫌票价太贵：

“您说不算贵？您想想，您一年大学教授薪水，能够买几张船票呢？”

“哎呀，我的女孩啊，爸爸买一张船票给你坐，你还嫌贵；若是爸爸买一艘轮船，陪送你嫁人，你还嫌贵不？”

“哎呀，我的爸爸啊，象票价这样贵，您得当多少年教授，才买得起一艘轮船给我呀……”

“爸爸今年刚到五十岁，再当五百年教授，在我女儿出嫁的时候，我一定陪送你一艘美国轮船，头等的漂亮轮船。”

可是，我们坐的这艘美国轮船，并不漂亮。它停在波浪

滚滚的江上码头，就象刚刚从江底捞出来似的，浑身泥沙。而且，我们二等船票的舱房也没有了，被塞进餐厅就算作罢。这儿还是特别挤，在地板上，我们三个人好不容易挤出两个人睡觉的地方。如要描写这艘船，那有三个字就够了：脏，挤，乱。如要一定找点漂亮的东西，那倒有漂亮的——从美国船长到美国守卫，都别有味道：衣服穿得那么白，帽子戴得那么歪，口哨吹得那么响，眼珠子滚得那么活，脚步走得那么闲……既亚赛风流小生，又好比纨绔子弟；论漂亮，如此而已。说起旅客，倒有各式各样的人物。三四等舱的人们，都象货物一样，装在一起，而所差的是，三等货装在甲板上，四等货装在船底下。反过来，舒适单间的头等舱旅客，大多数都是洋行的老板之类的，太古牌的，美孚牌的，怡和牌的，花旗牌的，雁丰牌的，麦加利牌的……一句话，差不多都是“上海——冒险家乐园”的代理人牌的。至于二等舱的旅客，用我们餐厅里的人们，可以代表：没有坐飞机资格的、或没有买到头等舱票的，穿着黄军装和大马靴的、长衫和坎肩外披中国式风衣的国民党官员，和他们的太太、姨太太、小姨太太及其子女等等；再剩下来的就是我们这路的——为了坚持抗战的提着小稿箱的作家、戴着八百度近视眼镜的大学教授、携着心爱的书报《论持久战》、《新华日报》的革命救亡人物等等。突然，在快要开船的时候，我们这里添了一位特殊的外国人。

他，虽是外国人，但穿的是中国粗布军装，腰上带着一支左轮子枪，是手枪中最有威力的枪。他，虽是黄头发、蓝

眼睛、高大鼻子，但他没有船长和守卫黄头发、蓝眼睛、高大鼻子的那种神气。他一进餐厅门，就先用中国话说一句：

“您好！”

从他的服装上、神情上，特别是他的这句中国话上，根据抗战的常识，我们都能肯定他是中国军事顾问人员——苏联同志。

这位教授女儿——女大学生，极其热情，除了熟练的英语，还会说几句俄语；她为了向援助祖国抗战的国际友人表示敬意，特意说了一句俄语：

“您好！”

这位国际友人一见，厅里挤满了人，就退到门外去。而女大学生仍是为了向援助祖国抗战的国际友人表示敬意，特意把自己刚刚挤到的一个座位让给了他，并说了一句俄语：

“请，请……”

“谢谢，谢谢。”

可是，他没有进来坐，仍旧站在门外。按他们的习惯，都是男人让座给女人，哪有反行其道之理呢？

“谢谢您援助我们抗战的辛苦！”她用英语说。

“这是我们的道义、我们的责任。”他也用英语说。

“这……”她指的是座位。“这是我们的友谊、我们的敬意！”

在她诚恳的谦让中，再不能拒绝这种友谊与敬意了，他才走进厅里坐下来。这样，他就成了我们的同伴。

随着，我们的同伴摘下帽子，松了松皮带，把左轮子枪

从腰侧移到腹前，象是便于看护或使用似的。

我们的女大学生，一看见枪，就发生了兴趣。中国抗日战争有一年多了，她从来还没有摸过枪；对于它，她有着种种的梦想，看了再看，看不过瘾，就说了话：

“您可以把枪借给我摸摸吗？”

她的爸爸瞪起了眼睛，开了口：

“枪可不能随便摸，那不是好玩的！”

我们的同伴，为了不使她失望，给她讲了这枪的构造和效能，尤其是它的久远的来历。

在一九一七年，彼得格勒的工人举行罢工、示威游行，同警察发生武装冲突的时候，有一个工人从警察手里夺过来一支手枪。那个工人，就是现在我们的同伴的父亲；那支手枪，就是现在我们的同伴身上挂的左轮子枪。它曾反对过沙皇，反对过克伦斯基，反对过托洛茨基，反对过英美帝国主义。在苏联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际，它的主人由于追击科尔尼洛夫受了重伤，而终于致死。在弥留之间，他给儿子留下了遗嘱：“这枪的历史，就是我的历史、苏联的历史。现在，我把它给你，你要记住，它获得过布尔什维克的光荣、列宁的光荣……此后，它落到你手，你不能辱没它……”

说话的人，说完了，他最后又加了一句：

“它又将获得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荣！”

这个故事，引人入胜；特别是最后又加的一句话，使人鼓舞。

差五分钟到了下午四点钟，到了开船的时间；这一刻，

怎不令人迫切而急待啊。每个出过门、坐过车船的人，都懂得，起程前的片刻，多么折磨人；启航渐渐迫近的瞬间，又多么兴奋人；万一误了点，更多么气恼人，何况又是战时紧急的撤退。而现在，我们正在尝着这种气恼人的滋味。因为起锚之前的检查未毕，宣布延迟四十分钟开船。大家都不耐烦了，许多旅客骂起来。我们这位女大学生，就从美国轮船票价，骂到美国帝国主义，表现了“五四”反帝传统的气概。而她的爸爸说：

“一寸光阴一寸金，四十分钟太短了……”

乍一听他的话，还听不大明白，究竟是个什么意思。但不一会儿，有事实说明了。果然，轮到检查我们餐厅旅客的时候，误时更长了。问题在于美国检查员借口海关条例，没收了旅客一块带有纪念性的银元，发生过一阵争论。结果，美国检查员还是把那块银元放进自己的兜里。这使我们的同伴大为反感，禁不住横眉竖目起来，眼盯住他凑到我们大学教授跟前，理直气壮地问道：

“喂，你带的什么？”

“我戴的近视眼镜，没有别的。”教授玩世不恭地答道。

“我问你带了什么东西？”

“我带了一个不愿做奴隶的女儿，没有别的。”

这个带着一个守卫的尊严的检查硬汉子，在教授面前，碰了两个俏皮的橡皮钉子，显得异常尴尬，狼狈；为了摆脱窘境，顺便在我们女大学生的脸蛋上摸了一下，聊以解嘲地

打了个口哨。此时，我与教授忍不住愤慨，起而干涉。而女大学生拦住我们，自己一个人以无所畏惧的抗日英雄气势，冲向前一把抓住侵犯人权、侮辱妇女的无赖的衣领，喊道：

“你别走，站住！”

横行惯了的强人，对于意外的反击，的确没有精神准备，所以他被她这一揪，这一喊，吓得吃了一惊，忙说道：

“放开手，礼貌些。”

“对你，这就是礼貌！”

紧跟着，她就给他一个大嘴巴。这个响，响得真脆快，竟使厅内旅客们喊了一声：

“好！”

这时候，他摆出帝国主义者的凶相丑态说：

“你一个中国人，竟敢在我们美国船上打我吗？好吧，你看看我的厉害……”

我们的同伴猛地站起来，愤怒地说道：

“我在此，我要亲眼看看，你胆敢再次欺辱中国人民！”

当头一棒，受了击中要害的人，反而不在乎，以“笑骂由你、其奈我何”的态度，打起了轻蔑的口哨。于是，更加激怒了富有正义感的我们的同伴，严正抗议：

“你不尊重中国人民、欺辱中国人民，就是美帝国主义者们的罪行！”

被骂的人，受不住了，就转过身来，走到骂他的人的面前，怪腔怪调地问：

“朋友，你是哪国人？”

“用不着问，你该知道。”我们的同伴，仪表庄重，堂堂正正地高声地答。

“你是俄国人吗？”

“我是苏联人！”

“我问你，你既是俄国人，你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人说话？”

“现在，我为神圣的中国抗战服务、为伟大的中国人民服务，我就有资格说话。”

“现在，你有资格对日本人说话，但你没有资格对美国人说话。你以为怎样，先生？”

“我不但对美国人，而且对各国人都可以说我应该说的话、必要的话。你以为怎样，先生？”

“那么，在船上，我也有资格检查任何人；现在，我检查你，请你把手枪交出来！”

“为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先生，你如果有常识的话，那么你应该知道：在这次中日战中的美国态度，是中立的、中立的。因此，我不能容许任何武器侵犯中立国——美国的船只。”

“我认识美国，更认识帝国主义。我的手枪，曾经反对过帝国主义，今天又在反对帝国主义。它代表苏联的尊严，也代表中国的尊严，绝对不能容许任何侵犯！”

被侮辱过被复仇过而被声援过的女大学生，拼着她所有的热情，喊起来了：

“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

这种反帝的流血斗争，到今天，我们已经流了一百年。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流过。一八八三年，甲申之战的时候，我们流过。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之役的时候，我们流过。我们年老的流完了，我们年小的流；我们一代一代地流啊流，流到“九·一八”，流到“七七”的时候。这个流血的口号，我们一遍一遍地喊啊喊，喊过无数遍、无数遍……望着“铁的浮城”，或是洋兵营，我们喊过。通过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的兆丰公园，或是租借地，我们喊过。我们年老的喊到死，年小的喊到老；我们一世一世地从陆上喊到水上、喊到船上、喊到我们这个女大学生口上。这并非她一个人的声音，是我们被损害的孤儿弱女的声音，是我们被欺凌的全国人民的声音，是我们被奴役而“不愿意做奴隶”的、全国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声音。因此，我们全厅绝大多数人由她带头都喊起来了。这说明我们各个旅客并非为零散的、单个的、孤立的，而是一个一体的整体人民；在北方且有整体人民为首的毛泽东，在身旁又有亲密的武装同伴，所以呼喊声音越喊越高。这高高的声，象海啸，象山呼，震撼甲板，惊碎水魂。

魂惊胆丧的美国检查员，一溜烟走了。我们以为一件未了的事，未了了之。到此刻，已经超过宣布的误时——四十分钟了。我们但等笛声一响，船一开航，便卸掉等待已久的